

论《百年孤独》的中国化阐释

曾利君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市 40075)

摘要:任何一种异质文化或外来文学在中国的接受,都有着多种层面的原因与复杂的机制。拉美文学代表作《百年孤独》在中国的接受就是如此。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中,对《百年孤独》的意识形态化、审美经典化与功利价值化不仅完成了《百年孤独》的中国化阐释过程,也使得《百年孤独》在中国的跨文化接受与传播得以成功实现。

关键词:《百年孤独》;接受;意识形态化;审美经典化;功利价值化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2-0166-04

在20世纪以来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上,《百年孤独》以其在中国接受的广泛性与持久性,其跨文化接受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例。《百年孤独》为什么能够在中国获得广泛而持久的接受与传播呢?笔者认为,对《百年孤独》的意识形态化、审美经典化与功利价值化不仅完成了《百年孤独》的中国化阐释,也是《百年孤独》在中国的跨文化接受与传播得以成功实现和持久延续的基础和关键。

一、意识形态化

这里所谓意识形态化,指的是从政治意识形态角度找寻中国接受《百年孤独》的合法性,具体体现为强调和挖掘《百年孤独》的政治进步性,肯定作者为我们所认同的政治立场与倾向。

在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常常与先进、革命等隐喻着历史走向的肯定性内容联系在一起。先进与落后、革命与反动是现代中国以来我们择取外国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考量标准,也是20世纪以来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获得接受与否的一个重要前提。尤其是在建国以后,政治倾向性、思想“进步性”成为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获得广泛认同的合法性外衣。虽然“文革”后的中国文学界逐步摆脱政治干扰,但绝对脱离政治也是

不可能的。所以,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合法外衣,对《百年孤独》的中国接受来讲,仍然十分需要。

纵观《百年孤独》的中国化阐释与跨文化接受过程,政治意识形态因素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最初,中国学者在介绍《百年孤独》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声明其思想内容的政治倾向性和进步色彩,比如陈光孚称《百年孤独》等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具有“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的积极意义”^[1];林一安充分肯定了《百年孤独》的思想进步性,认为《百年孤独》勾勒了“殖民者贪得无厌的嘴脸”,作家的意图,是要反映拉美社会的异化现象,“资本主义社会使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冷漠和疏远,使人在人群中感到极度的孤独”^[2];朱景冬认为,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的一大特点是“具有明显的社会、历史、政治倾向。他的作品主要表现历史事件、社会问题和现实生活,揭露独裁者的面目,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抨击时政的流弊,鞭挞社会的不平,同情人民的疾苦,反映世态的炎凉和各种人物的精神状态等等”^[3];到世纪之交,学者们依然在作类似阐释,如段若川说《百年孤独》“向人们剖析拉丁美洲贫困落后的原因,从而激发各国人民从落后中觉醒,以反抗使他们陷入‘百年孤独’境地的新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走向民族独立和解放的

* 收稿日期:2008-10-28

作者简介:曾利君(1965-),女,重庆合川人,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比较文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汉译传播与接受研究”(07JA752012),项目负责人:曾利君。

道路”^[4]。以上这些说法颇为耐人寻味：“反帝反封建”是中国现代以来评说进步文学作品所常用的标签,《百年孤独》因此被归入“进步”作品之列;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之说,则在暗示该作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反衬作用;而具有反霸权、反殖民倾向、“描写对殖民者的反抗,表现民族觉醒与独立解放”的作品在我们看来,也通常是具有进步政治倾向的作品。这里,种种评说都在一定程度上沿着政治意识形态的逻辑肯定与赞赏着《百年孤独》。

这些言说背后潜藏着政治色彩与身份认同感。《百年孤独》诞生于拉丁美洲的特殊土壤中,在遭受殖民统治和外国列强的掠夺方面,解放前的中国和当年的拉丁美洲颇为相似;新中国成立后,拉美各国也基本上摆脱了殖民统治,但又开始了反对美、英、荷兰等国扶植的傀儡政权的斗争,由于拉美诸国同中国曾有相似的境遇又同属第三世界,中国因此把拉美国家视为同一战壕的战友。来自拉美、有着“进步”色彩的《百年孤独》在中国自然容易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获得接受基础和意义阐释。

中国学界对《百年孤独》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政治立场的关注也在强化这种认同感。1979年,就有学者指出,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仅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在“六十年代初期,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声援和支持过古巴革命”,“对于我国,至今未见加西亚·马尔克斯有什么不友好的言论”^[5]。1983年5月,在西安召开的“全国加西亚·马尔克斯及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讨论会”上,学者们首先论证的也是马尔克斯的政治进步性。90年代,朱景冬借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拉尔斯·吉伦斯坦的授奖辞称赞加西亚·马尔克斯:“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像其他大多数拉丁美洲的重要作家那样,在政治上坚定不移地站在广大民众一边,反对暴力统治和经济剥削。”^[6]

对《百年孤独》政治意识形态角度的观照与评说,并没有随着时代语境的改变而消失,到新世纪初,其政治倾向仍不时被提起。人们还更多地考虑了作者的政治倾向,比如较早译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林一安称马尔克斯是“满怀政治激情的作家”^[7]。陈众议也提到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卡斯特的挚友”并“一直以左派喉舌自居”^[8]。学者们对作者政治热情和左翼背景的关注,实际上进一步提醒国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在理解、阐释《百年孤独》时,仍然要注意其思想意义和政治介入性,这在客观上起到一种暗示作用;《百年孤独》及其作者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与我们始终是一致的。

对马尔克斯及其《百年孤独》的政治意识形态理解和阐释虽然带有政治性误读的成分,却是为了“适应国情”所作的中国化认定,它使一个异质的文学文本——《百年孤独》获得了中国价值系统的肯定,在客观上促成并推动了《百年孤独》在中国的跨文化接受与传播。

二、审美经典化

当然,如果仅凭强调《百年孤独》的政治价值和效用,将其审美价值和功用悬置起来,显然还无法让《百年孤独》真正在中国大行其道。毕竟,它不是政治宣教的工具,而是文学作品,应该为人类提供多方面的价值满足。所以还须从审美价值角度对它进行肯定和维护,找寻其被接受的合理性,说明它是不容置疑的文学审美“经典”。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不同国家的多种奖项已给《百年孤独》带来了极高的声誉,为其确立了经典地位;但它若要在我国获得成功接受,还需要审美价值的进一步认定来“造势”,还需要证明彼经典正是我们眼中的“此经典”。而对其艺术魅力与文学价值的定位而言,来自学界的的声音和读者的广泛接受尤其具有说服力。

如果说当初中国学界部分论者对《百年孤独》的关注的主要目的不在文学性/审美性价值本身,而是政治认同,也有人在关注作品的审美意义,他们极力描述《百年孤独》的内在美学要素,发掘其“审美性”的内蕴和特质,以说明其成为经典文本的必然性、接受的必要性和不容置疑性。

自80年代后期起到新世纪初,中国学者不断从各种层面阐释着《百年孤独》的文学经典特质,认为以《百年孤独》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价值表现在它“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超越”,“有其神话学意义上的价值”,其艺术形式本身也是“极有价值”的^[9];从创作手法上看,它显示出一种陌生化的新质,是“现实主义的新发展”^[10];其文本本身拥有足够丰富的文化信息含量,“跨越拉丁美洲古今文化,跨越欧洲和拉丁美洲文化,跨越中西异质文化,是古今中西文化群居杂交的宁馨儿”^[11],是一部文化百科全书。以上观点表明,《百年孤独》具有了超越一般文学文本的艺术品质,是意蕴丰富、极富创新性的文学经典。

理论界对《百年孤独》的审美价值定位,为在中国人心目中构建起《百年孤独》的文学经典地位起了莫大的作用,因为“从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来看,文本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是经典化的基础”,“一般

地讲,当文本经典化进程开始的时候,首先是文本的内核如思想内涵、审美意蕴、艺术手法、题材、体式等在起作用”^[12]。理论家们对《百年孤独》文本特征的描述与论说,既从学理角度概括出《百年孤独》的文本价值,又以带有价值判断的言论影响着《百年孤独》在中国经典地位的确认。根据美学或文化的标准,《百年孤独》在中国人的文学视野中无疑进入了“经典”的行列。

有学者认为,“历史经典”的形成,是自我经典化、市场经典化、话语权力经典化“三个方面努力”共同作用的结果^[13]。《百年孤独》在获得话语权力经典化的同时,人们也通过对其市场接受状况的数据描述来强化其在中国语境中的经典地位。《世界文学》1982年第6期在译载《百年孤独》时,何榕在前言中介绍:“《百年孤独》自问世迄今,已被译成三十二种文字,总发行量逾一千万册”;2007年,于凤川在2007年6月13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又推出了新的统计数字:“《百年孤独》自1967年5月在阿根廷出版以来,销量已达3000万册,仅今年3月推出的《百年孤独》40周年纪念版就售出了100万册。”庞大的数字足以说明《百年孤独》被广泛接受的事实。另外,各国文学评论界发表的高度评价或赞扬《百年孤独》的文章和言论,也时常见诸各类有关《百年孤独》的文章和著作中。这些数据和资料表明,《百年孤独》显然是在本国和别国被读者广泛阅读和受到文学批评家赞誉的作品,这一事实进一步说明:《百年孤独》是有着经典价值意义的作品。而这一价值认定反过来又必然会对人们的接受心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此外,现有学术制度化与经典化现象及其相应的规范秩序也在强化《百年孤独》的经典权威性并推动其中国接受。学术的制度化与经典化培养起人们对《百年孤独》的“经典”敏感,对经典的敏感与推崇又促使人们试图用制度手段推动作为经典的《百年孤独》的阅读与接受活动。现代大学中都有学生“必读书目”与“参考书目”,必读书目上开列的都是一些经典著作,它们代表了大学教育的一种规范性标准。通过阅读与接受这些著作,学生就可以进入“经典作品”的文化资源库,获得研究资源与精神滋养和审美判断。《百年孤独》在许多大学被纳入“必读”之列,是外国文学类的必读著作。从这一事实来看,学术的制度化与经典化及其规范和秩序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对《百年孤独》的中国接受与传播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三、功利价值化

文学接受离不开现实语境,《百年孤独》与中国文学发展诉求的契合,是它在中国获得成功接受的又一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百年孤独》在中国的意义不在于有多少人阅读它,喜欢它,而在于它能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什么。在这一点上,《百年孤独》的“有用”似乎显示出它巨大、超凡的现实意义:在中国人看来,《百年孤独》指明了中国文学的前进方向和可以取法的文学发展模式及其可资借鉴的文学表现手段。《百年孤独》对中国文学所特有的功用价值为它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与接受找到了更充分的理由和无可辩驳的“价值依据”。

时值80年代中国文学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诉求日益强烈,《百年孤独》适时进入中国,顺应了中国文学的现实发展要求,成为中国文学现代化展开的实践逻辑的根基与参照实例。有关它的文学接受最终与中国的文学现实实现了完美融合。

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引起了人们对他以及拉美文学的极大关注,引发了中国人的“诺贝尔情结”。无论是中国的文学研究者,还是中国的文学创作实践者,都很想弄明白这样一个问题:拉美文学何以会取得成功?或者说,中国人长期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而拉丁美洲自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初的几十年间,已先后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等4位重要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为什么?人们开始从拉美文学的发展模式中找寻成功的经验与答案。

单从发展模式看,拉美经验似乎值得取法。到底是要现代主义还是要民族主义?这是长期困扰着落后国家和民族的作家和艺术家极难解决的两难问题。拉丁美洲的文学家们经过几十年漫长而艰苦的努力,终于找到了一条摆脱这种两难局面的出路。拉丁美洲文学成功走向世界的经验告诉我们:拉美文学能走出拉丁美洲,除了有坚实的民族文学基础外,还在于它大力引进了欧洲的现代艺术手法。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作家创作的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而外来的艺术形式和手法在表现现实生活 and 丰富文学的艺术形式方面,也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加西亚·马尔克斯把印地安文学和欧洲最新的艺术手法结合起来,闯出了一片新天地。那么,中国文学是不是也能够走这样一条路呢?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成功使中国人相信,中国文学要走向诺贝尔文学奖,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只有像拉美文学那样以民族文化为依托,兼收并

蓄,去释放现代精神,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正如一位学人所说:“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是成功的,大约还有许多的经验可总结,但有一条可能对我们更有现实意义,那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的,‘以世界上的全部成就充实自己’。……我们在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学时不妨学习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们的精神。”^[14]从这里,中国人找到了处理文学借鉴问题的经验,看到了将中国文学发展的希望变成现实的曙光。

作为参照与榜样,以《百年孤独》为代表的当代拉美文学备受推崇。人们据此对中国文学作出新的“规划”与设想:李陀大声疾呼应当重视拉美文学的发展模式,“拉美文学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国文学发生重大的影响”^[15];李欧梵把马尔克斯和昆德拉作为“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从中国文学发展战略出发,郑重推荐给中国文坛^[16]。这些观点应和着中国文学的发展诉求,显示了中国文学界对拉美文学成功经验的借鉴渴望。事实上,中国作家也是把《百年孤独》作为师法对象和中国文学发展新变的推进器来看待的。在刚刚从压抑禁锢中解放出来的新时期之初,作家和读者对文学都充满了热情。就作家而言,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作家热情最为高涨、探索最为积极、创作成果极为可观的时期,他们很想打破既有的创作规范与樊篱,从外来文学中求得新变的法宝和门径,而在当时,文学变革创新过程中的一个绝佳的师法对象似乎就是《百年孤独》。于是,出现了中国作家积极“拿来”《百年孤独》的技法为我所用的盛况,从扎西达娃、莫言、贾平凹等作家的小说创作中,我们确实可以感受到由《百年孤独》所带来的新的艺术因素的介入,感受到作家们为了创作上的突破和对旧有美学规范的超越而作出的努力,也可以看到《百年孤独》在中国文学发展路径的选择上所起的影响作用。

综上所述,《百年孤独》在中国的跨文化接受与

传播背后,有许多值得思考探究的因素与机制。只有充分了解并深入分析这些复杂的因素与机制,才能对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文学及其影响、接受关系有切实的理解和创造性的解读,找到包括《百年孤独》在内的异质文学在中国传播、接受的奥秘,积累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有益经验,真正进入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之中。

参考文献:

- [1] 陈光孚. “魔幻现实主义”评介[J]. 文艺研究, 1980(5): 131-138.
- [2] 林一安. 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及其代表作《百年孤独》[J]. 世界文学, 1982(6): 124-138.
- [3] 朱景冬. 当代拉美小说概观[J]. 外国文学报道, 1983(5): 1-8.
- [4] 段若川. 安第斯山上的神鹰[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183.
- [5] 林旸. 马盖斯及其新作《家长的没落》[J]. 外国文学动态, 1979(8): 23-29.
- [6] 朱景冬. 马尔克斯[M]. 长春: 长春出版社, 1995: 331.
- [7] 林一安. 《百年孤独》与魔幻小说[N]. 新京报, 2004-10-04.
- [8] 陈众议. 加西亚·马尔克斯: 八十和四十[N]. 中华读书报, 2007-05-23.
- [9] 马小朝. 论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及艺术价值[J]. 外国文学评论, 1990(1): 38-45.
- [10] 远浩一. 现实主义的新发展——读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有感[G]//柳鸣九. 未来主义 超现实主义 魔幻现实主义.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 [11] 黄俊祥. 简论《百年孤独》的跨文化风骨[J]. 国外文学, 2002(1): 98-103.
- [12] 赵学勇. 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处境和命运[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5): 5-12.
- [13] 韩云波. 金庸小说第三次修改: 从“流行经典”到“历史经典”[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1): 41-44.
- [14] 远浩一. 关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J]. 当代文坛, 1985(12): 61-64.
- [15] 李陀. 要重视拉美文学的发展模式[J]. 世界文学, 1987(2): 282-288.
- [16] 李欧梵. 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 南美和东欧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发[J]. 外国文学研究, 1985(4): 44-51.

责任编辑 韩云波

Chinese Interpretation of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ZENG Li-jun

(School of Literature,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The acceptance of any heterogeneous culture or foreign literature in China has a variety of reasons and complex mechanism, and the acceptance of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as one of the masterpieces of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in China is no exception. In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times, ideologification, canonization of aesthetic and utilitarian acceptance of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fulfills not only the process of localization of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in China but also the acceptance and propagation of it successfully in China.

Key words: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acceptance; localization; ideologification; canonization of aesthetic; utilitarian acceptance